

浙江地方童谣的美育精神发掘

卓伊铃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DOI:10.32629/er.v9i3.6861

[摘要]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浙江地方童谣赖以传承的社会文化生态趋于衰弱，其美育价值亟待重新认识。本文从语言人类学与民俗美学视角出发，对方言音韵、物质风俗与精神价值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浙江童谣以吴语为载体，其浊音声母、复杂声调及话题优先句法，塑造了独特的音韵审美形态；童谣生动记录地方物产、节气民俗，成为承载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活态文本；在价值层面，它体现了务实求存、开拓进取、幽默豁达的地域精神，并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浙江地方童谣既是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也是联结地域文化传承与儿童美育实践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 浙江地方童谣；美育精神；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Exploring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Ethos in Zhejiang Local Nursery Rhymes

Yiling Zhuo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ocio-cultural ecology necessary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Zhejiang's local nursery rhymes is diminishing, making their aesthetic-educational value urgently in need of re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folk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rhym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dialectal phonology, material customs, and spiritual values. Carried mainly by the Wu dialect, Zhejiang nursery rhymes retain voiced initials, complex tone systems, and topic-promin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ive phonological aesthetic. These rhymes vividly document local produce, productive practices, seasonal rhythms, and folk rituals, thereby serving as a living textual form that carries local lived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terms of values, they embody the long-formed regional spirit of pragmatism, perseverance, pioneering ambition, and humorous resilience, while also exerting a subtle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Zhejiang local nursery rhymes are not only a precious heritage of folk literatur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cultural resource bridging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Zhejiang local nursery rhymes; aesthetic education ethos; folk culture

引言

童谣，亦称孺子歌、童子歌，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它以其简短合韵的艺术形式，记载特定地域的饮食、礼仪、生产等文化内容，反映区域共同体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浙江地方童谣作为重要分支，在历史积淀中承载并传递着独特的浙江美育精神。同时，它也是儿童接触世界的诗性启蒙，以契合天性的方式，将劳作、伦理与风俗转化为可唱可感的记忆，在儿童心中埋下美的种子。然而，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下，传统乡土社会结构趋于松散，童谣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遭遇挑战。当代儿童普遍缺乏接触方言童谣的语境，成人社会亦常因童谣内容俚俗而轻视其价值，致使这一口头传统陷入传承困境。

本文旨在系统阐释浙江童谣所蕴藏的美育精神，深化对其人文内涵与教化功能的理解，以唤起学界与社会对其保护传承的广泛关注。

1 语音文化的温婉之美

方言是地方文化生存与传播的核心载体，童谣本质上是一种方言文学。语言学家沈兼士认为：“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1]。”浙江方言以吴语为主，其声调绵软、语流婉转，素有“吴侬软语”之称。吴语在节奏上通过连读变调形成绵密语流，在旋律上因保留全浊声母与复杂声调而音高丰富、曲拱平滑。用吴语念唱的童谣，自然浸润着独特的听觉美感。

吴语语音的一大特征是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在

多数方言已浊音清化的背景下，吴语仍存此古音遗韵。全浊声母（如[b]、[d]、[g]等）发音时声带振动，音色低沉厚重。如宁波童谣《摇啊摇》中“外婆”[ŋa bu]的发音，浑厚饱满，赋予童谣沉稳温润的底色。同时，吴语韵母系统单元音丰富，共鸣状态稳定，听感圆润柔和，构成其“软糯”特质的声学基础。《摇啊摇》中“桥”[dziə]与“摇”[jiə]押韵，韵母[iə]开口度小，元音[iə]共鸣饱满，营造出摇篮般安稳柔和的氛围。吴语声调系统复杂，多保留七至八个调类，延续中古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格局。连读变调规则赋予语句天然的节奏与旋律。童谣《一粒星》首句“一粒星，轧楞腾”，六字连读后声调依规则调整，形成流畅起伏的语音流，增强了音乐性。儿童在传唱中锻炼韵律感，并学习通过声音变化传递细腻情绪。

吴语词汇极富地方特色与形象性。名词词头“阿”应用广泛，如绍兴童谣《阿大叮当》通过“阿大”至“阿十”的列举，展现其在排行称谓中的使用。名词词尾“头”能产性高，构成如“桥头”“苦头”等词。吴语词汇还具有摹形化特征，善于用具象视觉符号指称事物^[2]，如“百脚”（蜈蚣）、“弯转”（虾）、“乌珠”（眼球）。绍兴童谣《荠菜马兰头》中“两只眼睛乌珠当门”一句，引导儿童以多感官方式观察世界。

句法上，吴语呈现鲜明的话题优先特征，受事成分常前置^[3]。如普通话“我吃过饭了”，吴语常说成“我饭吃过了”。绍兴童谣《柯来鱼虾别人家》中“柯来鱼虾别人家，自吃三餐豆腐渣”，“柯来鱼虾”提至句首作主话题，突出了劳动成果与他者享受的对比，强化了语义张力与情感效果。这种句法结构不仅是一种语言习惯，更在深层塑造儿童认知世界、组织信息的方式。

总之，吴语童谣保存了诸多古汉语元素，吟诵时音律婉转，刚柔并济，尽显江南水乡的清雅乐韵。儿童在反复念唱中增强语感，掌握方言规则，深化乡土认同。吴语通过其存古的语言特征和话题优先的句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沟通风格。

2 物产富足之美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河网密布，物产丰饶，在稻作耕读文明中孕育了独特的物质文化与生活风俗。地方童谣如同鲜活的记忆库，记录了大量的物产、景观、器具与技艺，蕴含着深厚的乡村文明，折射出民众的文化观念。童谣中充满了对浙江特有物产的歌咏。绍兴童谣《神仙看见嘴也馋》提及“霉苋菜梗”“乌干菜”等特色腌制品及本地农作物；宁波童谣《鱼鲜歌》唱出“咪咪虾鱼”“带鱼”“泥螺”等东海海产。这些记载不仅反映物产，也体现饮食文化中“时令而食”的智慧，如清明做青团、立夏吃乌米饭、冬至煮红糖圆子，彰显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饮食人类学家西敏司

指出：“人类赋予饮食的象征意义远比其简单的内涵丰富得多。”^[4]童谣中的饮食记载，正是这种象征意义在民间文学中的呈现。童谣也记载了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建筑、器具与工艺。《石桥谣》《天封塔十八格》等描绘了桥梁、古塔等地标建筑，浙江作为水乡，桥梁是连接城乡的必需品，古塔寺庙则映射其作为吴越文化核心区及佛教传播重镇的历史地位。《踏水车》《招蚕花》等童谣中出现的农桑工具与技艺，则是民众为适应自然、提升劳效创造的智慧结晶，反映地方技术的积累与传承。这类童谣从儿童视角出发，以通俗语言勾勒自然与人文景观，使儿童在吟唱中感知名物风土，理解地方文化内涵。

民俗是地域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并世代相袭的文化事象。郑蕙苡认为，民俗既是一个民族或地域固有的传统文化特质所在，又是一个民族或地域文化创造与发展的根基^[5]。浙江人民重视岁时节气，遵循自然规律安排农事生活。宁波《十二月歌》是典型代表：“正月拜岁嗑瓜子，二月空畝放鸽子……”按月叙述的节令活动，展示了农耕社会的年度周期与时间秩序。这种基于天文观测的节气体系，蕴含着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节气童谣为儿童打开通向自然的大门，引领他们感受生命律动与宇宙奥秘，建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整体宇宙观。岁时节气衍生出丰富的仪式与典礼。春节祭祖、清明踏青、端午竞渡、中秋拜月，以及地方性的元宵“桥烛”、蚕花庙会，均承载驱邪、纳福、团聚等多重社会功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仪式通过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加强社会稳定所依赖的情感体系^[6]。童谣如《着辣子》《正月十四夜》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在特定时令举行仪式以“驱邪纳福”的集体心理。清代方志记载的立春“鞭土牛”、正月晦“燃灯照屋角”等习俗，均寄托了保佑农桑、祛除疫病的愿望。祭祖活动在童谣中亦常见，体现深厚的宗族观念与伦理秩序。“落叶归根”隐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认同体系。祖先奉祀于祠堂，祠堂成为宗族存续、教化与凝聚的文化空间。祖先崇拜有助于世系群的稳定与社会结构的延续^{[7][8]}。童谣《清明戴杨柳》《拜太太》等，将抽象的宗族制度转化为佩戴柳枝、举行家祭等具体实践。儿童在参与这些仪式过程中，逐步熟悉宗族社会的运作逻辑，内化其中的伦理观念。

总之，仪式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实践，伴随个体与族群成长。儿童通过具身参与，沉浸于仪式氛围，感受其美学感染力。尽管他们未必立即理解全部象征内涵，却在认知深处埋下敬畏与认同的种子，强化对家庭、社群及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儿童逐渐内化社会规范，并外化为自觉行为。

3 精神价值之美

地域精神是文化共同体在共享传统中积淀形成的价值共识与人格特质。浙江童谣凝结了地方民众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可概括为务实求存、开拓进取、幽默豁达。

务实求存精神在浙江源远流长。从东汉王充、南宋陈亮、明代王阳明到清初黄宗羲，浙学传统贯穿着鲜明的务实特质。在民间，务实表现为生存压力下的行动智慧。童谣《精打细算巧安排》是生动写照：浙江山多田少、人口稠密，童谣中“田种九亩九分九”“上种大菱下种藕”反映了在有限土地上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的智慧。歌词描述家庭成员分工协作，形成农工商一体化家庭经营模式，是南宋叶适“四民交致其用”思想在民间的实践缩影。童谣以“精打细算巧安排，到了年底无外债，全家屋里笑哈哈”结尾，将幸福观建立在物质稳定与勤劳创造之上，传递勤俭、谋划的价值观。《抬石号子》等劳动歌谣同样体现重视实干的务实精神。

开拓进取精神植根于浙江陆海交织、人口稠密的生存境遇，是在适应与改造环境中形成的崇尚创新、勇于开拓的气质。从浙东学派主张“义利双行”，到近代宁波商帮跨海经营，再到秋瑾倡导革新，这一精神不断被赋予时代新义。童谣《一石米桶吃勿空》倡导合作共富，《乡下人》展现面对变迁的积极心态，《小白菜，嫩艾艾》记录宁波青年赴沪经商的历程。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童谣如《红毛鬼子最怕谁》《一根扁担软泛泛》等，融入了斗争意志、劳动热情与新时代道德。这些童谣以贴近经验的方式为开拓精神注入新内涵，在儿童传唱中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幽默豁达是浙江人洞察世情、调适心态的人生智慧，体现为品味生活境遇的从容态度。童谣《神仙看见嘴也馋》以白描手法记述烹饪细节，末句“神仙看见嘴也馋”运用夸张，打破世俗与神圣界限，表达品味生活本真愉悦的豁达。《三十夜月光烘烘》描绘除夕老人因贫行窃的辛酸，却用“瞎的看见，聋的听见”等荒诞句子呈现，是以幽默化解苦难、举重若轻面对无奈的体现。这种幽默缓冲现实挫折，使人在挑战中保持精神独立与心灵弹性，并在人际间形成宽慰与支持。

务实求存是坚韧之本，开拓进取是气魄之源，幽默豁达是生命底色。三者交融，构筑浙江精神的核心。童谣作为价

值载体，通过褒勤讽惰完成社会甄别与教化，为儿童树立是非观念奠定基石。这些特质凭借童谣的顽强生命力，持续塑造一代代浙江孩子的精神气质与文化人格。

4 结语

浙江地方童谣是方言音韵、物质风俗与精神价值的三重结晶，是集声音之美、生活之诗与精神之魂于一体的美育宝库。它承载着地域文化基因、民间智慧与群体价值取向。在现代化进程中，其传承虽面临困境，但美育价值历久弥新。系统发掘其美育精神，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地方传统的理解，更能为当代儿童教育提供富含养分的本土资源。未来的保护传承工作，需在记录、研究、教育与应用等多层面协同推进，使这份口头遗产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继续在儿童心中播撒美的种子，滋养文化认同的根系。

[参考文献]

- [1]申小龙.文化的语言视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2]王瑞祥,等.童谣与儿童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3]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J].方言,2001(4):332-343.
- [4][美]西敏司.饮食人类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 [5]郑蕙苒著.温州童谣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6][英]A. 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7]袁同凯.文化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 [8][日]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卓伊铃(2002.03-)，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学生科研创新计划(SRIP)”重点项目(2025SRIP0301)。